

ESG 建设与企业共同富裕

董晓林 张翔 部栋玺*

摘要: 加强 ESG 建设不仅是企业转型的内在要求,也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路径。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 2011—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 ESG 建设与企业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显示:ESG 建设显著促进企业共同富裕,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增强了这一边际作用。机制分析表明,ESG 建设主要通过发挥员工就业效应、员工保障效应和员工收入效应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共同富裕。同时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更高、外部治理压力更大以及融资能力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性研究表明,ESG 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还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而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ESG 建设;企业共同富裕;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企业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其在财富创造和初次分配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科学评估企业共同富裕,深入探讨推动企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公司使命观,认为企业最主要的责任是为股东创造利润。但随着气候风险加剧、自然资源紧张、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均衡等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这种“股东至上”的传统观点受到强烈挑战(张新民、金瑛,2022)。因此,为解决社会、环境、经济共生问题,基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企业 ESG 经营理念逐渐形成。该经营理念以环境保护和治理结构改善优化了企业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以社会责任承担保障了员工权益,有望成为激励企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之道。

随着国家对企业 ESG 发展的重视,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企业 ESG 的影响因素及其实施

*董晓林,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dongxiaolin@njau.edu.cn;张翔,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zhangxiang111019@163.com;部栋玺(通讯作者),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1815,电子信箱:desmondgdx@163.com。

本文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分配效应与战略协同研究”(2024SJYB0068)、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学科建设专项和“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ZDXM202202)的资助。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效果展开了研究。从企业 ESG 的影响因素来看,既有文献表明空气污染压力(潘玉坤、郭萌萌,2023)、低碳转型(徐妍等,2024)和碳交易制度(温慧愉等,2024)等环境规制手段是促进企业 ESG 建设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关于 ESG 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包含经济效应、环境效应与社会效应三个方面。从经济效应来看,已有研究发现 ESG 建设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谭劲松等,2022)和融资成本(李增福、冯柳华,2022),提高生产投资效率(刘一鸣等,2024)和企业价值(史永东、王淦森,2023)等。从环境效应来看,既有文献认为 ESG 建设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李慧云等,2022),从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胡洁等,2023)。但就社会效应而言,仅有少量文献探讨并证实了企业 ESG 建设能够促进就业(毛其淋、王玥清,2023)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聂辉华等,2022)。聚焦于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其二者间的理论机制探讨和经验分析亦不够深入。值得注意的是,与本文研究较为接近的是聂辉华等(2022)的文章,但他们仅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单一视角来表征企业共同富裕。本文则利用华证上市公司 ESG 评级数据,从综合表现视角系统分析 ESG 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共同富裕,并深入讨论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可能对上述影响产生的协同作用。

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如下:第一,拓展了 ESG 建设的社会效应和企业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 ESG 建设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仅有部分学者考察了 ESG 建设的社会效应,且较少涉及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则是从 ESG 建设视角出发,构筑其与企业共同富裕之间的重要桥梁,对已有 ESG 建设的社会效应以及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第二,丰富了企业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对于企业层面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本文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基础上,增加了让更多人“吃上蛋糕”和“吃好蛋糕”的考量标准,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层面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增益了企业共同富裕的内涵。第三,本文结论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是当前新发展格局下的迫切需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ESG 建设不仅可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还能够从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价值三方面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对于进一步实施政策引导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制度背景

1. 企业共同富裕

企业共同富裕是企业层面“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统一,“共同”代表公平共享,“富裕”代表效率提升。现有关于企业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富裕”角度通过增加总财富以“做大蛋糕”,即企业通过提高财务绩效以增加可分配利润的总量;二是基于“共同”角度通过优化财富分配机制以“分好蛋糕”,即企业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以提高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但除上述经济贡献外,企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还应从社会贡献维度做如下补充:一是基于“共同”角度通过促进就业以让更多人“吃上蛋糕”,即通过增加新就业机会以缓解社会“稳就业”压力和内部机会不均等问题;二是基于

“富裕”角度通过改善福利保障以让员工“吃好蛋糕”,主要体现在企业对改善员工劳动条件和完善保障体系的努力程度。

从上述四方面对企业共同富裕表现进行考察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低效率企业往往缺乏“做大蛋糕”这一物质基础,即使具备完善的分配机制和福利保障措施,也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其次,不重视“分好蛋糕”和让员工“吃好蛋糕”的企业,即便专注财务绩效提升、具备“做大蛋糕”的物质基础,但员工仍难以公平享有企业发展成果,容易导致劳动关系紧张、工伤和失业频发等问题;最后,企业若忽视创造新就业机会,无法实现让更多人参与到分享经济成果的过程中去,则可能会造成社会内部机会不均、收入差距拉大。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上述四个方面均是企业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表现。

2.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

企业固有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盈利和持续发展实现价值最大化,若无良好的外部制度和社会环境引导,其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难免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就该角度而言,政府在其中应当发挥超前引导作用,通过制度引导激励企业利用数字化手段来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企业共同富裕。随着当前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本文借助既有文献梳理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不仅拓宽了数据要素流动与共享渠道,而且完善了大数据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制度与设施保障。由此带来的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优化投融资决策(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8),从而为实现更公平的利润分配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地位和收入。此外,数字技术具有共享、普惠、包容的特性,这使得基层员工和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以提升自身技能的价值含量和劳动报酬,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性。由此可见,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带来的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很可能会增强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二) 理论分析

1.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本文认为,ESG 建设能够通过发挥员工就业效应、员工保障效应和员工收入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

(1) 企业 ESG 建设的员工就业效应。ESG 建设可以通过发挥多维度的就业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即实现让更多人“吃上蛋糕”。首先,从环境维度(E)来看,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环保材料以及环保技术研发创新等可持续项目的投资,不仅促进了技术进步,还引入了对新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企业劳动就业。另一方面,企业对环境责任的承担有助于塑造品牌形象,获取市场竞争优势,通过生产力效应进一步增加劳动就业,促进就业增长。其次,从社会维度(S)来看,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改善劳动条件、提供培训以及职业发展机会以建立起负责任的企业形象。而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求职者会更加倾向于接受和赞许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从而增强了这类企业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最后,从公司治理维度(G)来看,代理理论强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减轻管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并通过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经营效率,以增强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为企业创造了稳定的经营环境。而良好的经营环境有利于企业生产规模和劳动力需求的平稳增长,从而为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1:ESG建设通过发挥就业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

(2)企业ESG建设的员工保障效应。ESG建设可以通过发挥员工保障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即实现让员工“吃好蛋糕”。从直接效应来看,在ESG建设背景下员工保障不再只包括物质报酬,还涵盖了劳动条件改善、心理健康支持、教育培训及职业发展机会等非物质保障(Zuo et al., 2022)。由此,企业的治理能力提升通过公平薪酬结构和透明晋升制度维护了员工的经济利益,而全面的福利保障计划则为员工的未来提供保障。这种保障水平的全面优化不仅增进了员工的个人福祉,也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展现了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从间接效应来看,高技能劳动力一般具有较高的工资议价能力和薪酬待遇。ESG建设加大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缺口,同时初始技能不足的劳动力也有机会通过培训提升自身技能价值。由此,随着企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企业会不断完善员工的福利保障体系,例如企业年金所提供的养老保障等,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共同富裕。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2:ESG建设通过发挥员工保障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

(3)企业ESG建设的员工收入效应。企业ESG建设对员工收入的具体影响在不同时期内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从长期来看,ESG建设有潜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即实现“分好蛋糕”目标。一方面,“创新补偿假说”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会倒逼技术升级,通过资本投入提高企业生产率,由此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另一方面,善待员工通常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企业在改善劳动条件、提供培训与职业发展机会、平等对待员工等方面的努力,也有利于提升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然而,这些积极影响的实现可能面临一些挑战。第一,ESG建设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承担较高的投资成本和建设成本。若增加的成本未能通过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完全消化,一方面可能通过价格机制与消费者寻求合理分担;另一方面,若囿于市场竞争难以实现价格调整,则短期内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从而挤占用于员工劳动报酬的资金,影响劳动者收入。第二,ESG投资的收益往往需要时间才能显现,短期内可能难以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而企业为了保持财务稳定和应对外部压力,需要调整支出结构,暂时性降低劳动报酬,从而影响员工收入。第三,ESG的建设目标之一是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种收入的再分配也可能减少员工收入,从而对企业共同富裕产生制约效果。因此,尽管ESG建设具有增加劳动收入的潜力,但其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3a:ESG建设通过员工收入渠道发挥创新补偿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

假说3b:ESG建设通过员工收入渠道发挥成本转移效应以抑制企业共同富裕。

2.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与企业ESG建设的协同作用分析

由理论分析可知,企业ESG建设的员工就业效应渠道和员工保障效应渠道对于企业共同富裕均为积极影响,但员工收入效应渠道则不然,其影响方向取决于企业ESG建设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和成本转移效应的相对大小。而既有研究已充分论证了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方明月等,2022;赵春明等,2023)。基于此,对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协同作用考察,本节将着重分析其如何通过员工收入渠道调节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

第一,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发展实现了数据要素流通和共享,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及时全面地了解企业 ESG 建设和共同富裕程度提供了支持。这不仅加剧了企业在该维度的竞争压力(王应欢、郭永祯,2023),还激发了企业在改善员工劳动条件和薪酬水平等方面的动力;同时数据信息共享也缓解了劳动者在进行薪酬谈判和工作条件追求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劳动者的议价空间,从而有利于员工收入水平提升。第二,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利用强化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能力三个维度的表现(李志军等,2024)。而上述三方面的改善将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产生吸引力效应(毛其淋、王玥清,2023),激发企业长期发展潜力,从而增加劳动力就业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第三,企业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技术升级效应,将引致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并挤出部分低技能劳动,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所推动的数字技术与应用,增强了 ESG 建设对员工收入渠道的边际提升效果,从而推动企业共同富裕。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4: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会对企业 ESG 建设的员工收入渠道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

1. ESG 建设与企业共同富裕

为考察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借鉴谢红军和吕雪(2022)等的模型设定思路,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Common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核心解释变量 ESG_{it} 为企业*i*第*t*年的 ESG 评级情况; $Common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共同富裕评分; $Controls_{it}$ 为企业特征变量矩阵。 μ_i 和 v_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类不随其他特征变化的个体和时间特征;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后文涉及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协同作用检验,本文模型统一采用聚类到更高层级(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协同作用检验

本文参考孙伟增等(2023)和郜栋玺等(2025),通过引入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这一外生冲击^①,以探究该政策推出及其带来的数字技术发展是否进一步强化了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Common_{it} = \theta_0 + \theta_1 BigData_{ict} \times ESG_{it} + \theta_2 ESG_{it} + \theta_3 BigData_{ict} + \theta_4 Controls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 $BigData_{ict}$ 代表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这一政策变量,若企业*i*注册地所属城市*c*在*t*年及以后属于大数据试验区,则 $BigData$ 取1,否则取0;交互项 $BigData_{ict} \times ESG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变量均与(1)式保持一致。

(二)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Common_{it}$ 。本文使用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

^①该政策的详细介绍及建设进展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团队测度的企业共同富裕综合评分(CPE指数),对企业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度量。企业共同富裕评分这一综合指标,除了包含企业收入规模、收入分配状况等经济维度外,更多关注了企业就业贡献、员工权益保障等社会维度,可以从“共同”与“富裕”双重视角来科学表征企业共同富裕的内涵。

解释变量 ESG_{it} 。本文参照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采用华证ESG指数的年末值来衡量企业ESG建设水平。

此外,参考既有文献的做法(方明月等,2022;毛其淋、王玥清,2023),企业控制变量 $Controls_{it}$ 依次包括:(1)企业规模 $Size$,由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衡量;(2)企业杠杆率 Lev ,采用负债总额与总资产之比衡量;(3)产权性质 Soe ,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值为1,否则为0;(4)独立董事占比 $IndepRatio$,采用独立董事人数对董事会总人数之比衡量;(5)两职合一 $Dual$,当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一职时,取值为1,否则为0;(6)企业现金流 $Cashflow$,采用经营性现金流量占总资产之比衡量;(7)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采用董事会人数的对数值衡量;(8)股权集中度 $Top1$,采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衡量;(9)账面市值比 BM ,采用股东权益与市值之比衡量;(10)企业年龄 Age ,由企业年龄取对数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此外,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信息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在获得初始数据后,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预处理:(1)删除财务数据缺失严重的上市公司样本;(2)删除ST的上市公司样本;(3)删除上市公司中的金融行业样本;(4)对企业层面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各1%水平的缩尾(Winsorize)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mmon$	30843	4.992	5	2.414	1	9
ESG	30843	4.117	4	1.103	1	6
$Size$	30843	22.20	22.01	1.298	19.89	26.21
$Lev(\%)$	30843	3.516	2.431	3.083	1.116	19.42
Soe	30843	0.344	0	0.475	0	1
$IndepRatio(\%)$	30843	37.64	36.36	5.362	33.33	57.14
$Dual$	30843	0.287	0	0.452	0	1
$Cashflow$	30843	0.046	0.046	0.069	-0.160	0.239
$BoardSize$	30843	2.123	2.197	0.198	1.609	2.708
$Top1(\%)$	30843	34.30	32.06	14.85	8.598	74.57
BM	30843	0.621	0.621	0.249	0.114	1.169
Age	30843	2.893	2.944	0.334	1.792	3.526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计量模型(1),表2汇报了ESG建设影响企业共同富裕的回归结果。为说明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改变模型设定的方式进行多次回归检验。其中,第(1)列是不添加

任何控制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3)列在第(1)列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双向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第(4)列则是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无论采取何种模型设定形式,ESG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充分说明,ESG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共同富裕。为进一步说明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以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的第(4)列为例进行阐述。核心解释变量ESG系数为0.117,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企业ESG建设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将使得企业共同富裕相比平均水平上升2.35%(0.117/4.992)。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Common			
	(1)	(2)	(3)	(4)
ESG	0.521*** (0.012)	0.180*** (0.014)	0.277*** (0.011)	0.117*** (0.013)
Size			0.917*** (0.011)	1.014*** (0.053)
Lev			0.002 (0.004)	-0.004 (0.008)
Soe			0.030 (0.028)	-0.069 (0.099)
IndepRatio			0.072*** (0.003)	0.065*** (0.004)
Dual			0.180*** (0.027)	0.083** (0.040)
Cashflow			4.438*** (0.173)	1.953*** (0.238)
BoardSize			0.160** (0.073)	0.022 (0.139)
Top1			0.015*** (0.001)	0.013*** (0.003)
BM			-1.391*** (0.055)	-0.322*** (0.097)
Age			-0.363*** (0.036)	-0.967*** (0.315)
常数项	2.847*** (0.051)	4.252*** (0.057)	-18.450*** (0.297)	-18.042*** (1.693)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30843	30843	30843	30843
调整R ²	0.057	0.684	0.306	0.719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ESG建设将通过发挥员工就业效应、员工保障效应和员工收入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接下来,本文将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上述影响渠道予以识别,以期为核心逻辑提供更直接的经验证据^①。

^①考虑到“做大蛋糕”是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本文在机制检验之前已对ESG建设能否提升企业营业总收入进行了检验,结果满足“做大蛋糕”这一共同富裕的先验条件。这与聂辉华等(2022)的研究发现一致。该部分内容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1. 员工就业效应

ESG建设为创造新就业形态提供了可能,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也间接扩大了生产规模,通过发挥员工就业效应以增加就业岗位,即实现让更多人“吃上蛋糕”,从而促进企业共同富裕。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是否成立,本文从劳动就业角度来考察微观层面的就业效应。本文使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劳动就业水平,并采用员工总人数(单位:千人)作为稳健性测度,检验结果分别见表3第(1)列和第(2)列。由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在99%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ESG建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就业规模,从而从员工就业效应视角支持了ESG建设能够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核心结论^①。

2. 员工保障效应

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区别于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自愿原则,建立与否并不受国家强制要求。这一特征体现了企业在提供员工福利保障方面的自主意愿(窦欢等,2023),比强制性的社保缴纳措施更能说明企业在员工保障方面的努力。基于此,本文选择企业是否建立年金制度作为员工保障效应的代理变量,并通过对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进行筛选和整理后,最终得到企业年金数据。在数据处理时考虑到年金制度正式出台前,企业可能已经缴纳了具有相同性质的补充养老保险。因此,本文将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中含有“企业年金”或“补充养老保险”字样且当年发生额不为0的企业,视为实施年金制度的企业,并构建虚拟变量(EA),实施年金制度的企业取1,否则取0。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分别列示于表3第(3)一(4)列。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采用何种估计方式,ESG的回归系数均在99%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ESG建设显著增加了其建立年金制度的概率,即ESG建设会通过发挥员工保障效应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从而验证了假说2。

3. 员工收入效应

前文先验条件的检验结果表明,ESG建设会通过“做大蛋糕”增加企业收入,但“蛋糕做大”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分好蛋糕”,即员工可以得到更多收入份额。由此本文将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对ESG建设的员工收入效应进行验证。本文选择以下两种方式测度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一是采用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概念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等,2008),定义劳动收入份额 $LS_1 = \text{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text{营业收入} - \text{营业成本} + \text{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text{固定资产折旧})$;二是使用劳动分配率的概念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衡量方式(王雄元、黄玉菁,2017),定义 $LS_2 = \text{应付职工薪酬} / \text{营业收入}$ 。回归结果分别列示于表3第(5)一(6)列。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ESG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即ESG建设通过员工收入渠道抑制了企业共同富裕,从而验证了假说3b。

^①此外,本文还参考了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的方法,按照员工岗位职能将样本分为生产人员、销售人员、财务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检验,以考察ESG建设对劳动就业结构的影响。企业生产人员、销售人员、财务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劳动就业相比平均水平分别上升5.82%、6.42%、0.14%和5.62%,从而从劳动就业结构的角度间接验证了企业ESG建设的就业效应。该部分内容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表 3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员工就业效应		员工保障效应		员工收入效应	
	InEmployee	Employee	EA(固定效应模型)	EA(Logit 模型)	LS_1	LS_2
	(1)	(2)	(3)	(4)	(5)	(6)
ESG	0.027*** (0.004)	0.134*** (0.032)	0.014*** (0.003)	0.160*** (0.049)	-0.004*** (0.001)	-0.001*** (0.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观测值	30842	30842	30843	26255	29042	29065
调整 R ²	0.935	0.916	0.534		0.687	0.738
伪 R ²				0.366		

(三)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与企业 ESG 建设的协同作用检验

为识别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与企业 ESG 建设的协同作用,本节将基于前文模型(2)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第(1)—(3)列。表 4 第(1)列展示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 ESG 建设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协同作用检验结果,第(2)—(3)列则列示了其对员工收入渠道产生的协同作用检验结果。根据表 4 第(1)—(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协同作用不仅强化了 ESG 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边际提升效果,还优化了 ESG 建设的员工收入渠道的成本转移效应,从而疏通了 ESG 建设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假说 4 得以成立。

表 4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员工收入渠道的协同作用

变量	(1)	(2)	(3)
	Common	LS_1	LS_2
ESG×BigData	0.082*** (0.022)	0.004*** (0.001)	0.001* (0.000)
ESG	0.097*** (0.015)	-0.005*** (0.001)	-0.001*** (0.000)
BigData	-0.394*** (0.106)	-0.012* (0.007)	-0.001 (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843	29042	29065
调整 R ²	0.720	0.687	0.739

为挖掘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 ESG 建设的员工收入渠道产生的激励效应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本节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升级视角予以考察。基于受教育程度差异的考察结果表明,在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协同作用下,企业 ESG 建设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从而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提供了佐证。此外,为了更系统而全面地识别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企业 ESG 建设产生的协同作用,本文还针对员工就业效应和员工保障效应进行协同作用检验,结果显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员工就业效应和员工保障效应的协同作用亦存在。^①

①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五、进一步研究

(一) 异质性分析

1. 内部治理能力

首先,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引发企业内部第一、第二类代理冲突,使得企业面临较高的代理成本。ESG建设具有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显著优势,且与公司内部治理能力正相关。内部治理能力较高的企业,本身往往容易拥有较高的ESG表现,从而具备高效从事共同富裕建设工作的客观条件。因此,本节将基于企业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冲突的治理能力差异,对ESG建设与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关系进行异质性分析,以识别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是否会因内部治理能力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本文预期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将在内部治理能力较高的企业中更为强烈。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本文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和机构持股比例作为公司内部治理能力的代理变量,分别对应企业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冲突的治理能力。具体地,以样本中位数为基准进行分组,当管理层持股比例或机构持股比例高于其样本中位数时,视为公司内部治理能力较高组,否则视为内部治理能力较低组,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的Panel A。表5中Panel A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治理能力较好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从而验证了前述推论。

2. 外部治理压力

多数研究表明,分析师为上市公司带来了附加的监督效能,特别是在约束盈余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促进公司责任感方面显示出积极作用(何慧华、方军雄,2021)。由此可见,分析师关注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在分析师关注较多的企业中,外部治理机制可以发挥较强的监督职能;而在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下,企业ESG与共同富裕建设工作能够更高效地进行。基于此,本文预期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将在外部治理压力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有效。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本文采用一年内覆盖该企业的分析师关注数量和研报数量分别作为分析师关注度和研报追踪度的代理变量,并用以衡量企业外部治理压力。分组检验标准同上,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的Panel B。根据表5中Panel B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外部治理压力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从而验证了前述推论。

3. 融资能力

企业融资能力差异也可能导致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产生异质性。而信贷能力和政府补贴是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体现。一方面,根据融资约束理论,信贷获取能力强的企业可能面临较低的融资成本和较为充裕的现金流,为其进行ESG建设提供重要保障,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通过补贴形式对企业ESG建设状况进行调控,不仅可以激励企业行为,而且向投资者传递企业在ESG建设等方面表现良好的积极信号,从而提升企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其融资能力。基于此,本文预期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采用企业在银行总借款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信贷能力的代理变量;同时,采用企业获得政府补贴金额的自然对数作为政府补贴的代理变量。分组检验标准同上,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的Panel C。观察结果可知,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高融资能力

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从而验证了前述推论。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Panel A 内部治理能力				
变量	Common			
	管理层持股		机构持股	
	高管持股	低管理持股	高机构持股	低机构持股
	(1)	(2)	(3)	(4)
ESG	0.135*** (0.020)	0.091*** (0.021)	0.141*** (0.022)	0.097***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632	11447	12223	11856
调整R ²	0.691	0.752	0.731	0.671
组间系数差异	0.044***		0.043***	
费舍尔检验P值	0.000		0.000	
Panel B 外部治理压力				
变量	Common			
	分析师关注度		研报追踪度	
	高分析师关注度	低分析师关注度	高研报追踪度	低研报追踪度
	(1)	(2)	(3)	(4)
ESG	0.138*** (0.020)	0.102*** (0.021)	0.152*** (0.019)	0.088***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625	11454	12231	11848
调整R ²	0.729	0.656	0.730	0.659
组间系数差异	0.036***		0.064***	
费舍尔检验P值	0.000		0.000	
Panel C 融资能力				
变量	Common			
	信贷能力		政府补贴	
	高信贷能力	低信贷能力	高政府补贴	低政府补贴
	(1)	(2)	(3)	(4)
ESG	0.135*** (0.023)	0.084*** (0.026)	0.136*** (0.021)	0.103***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444	7273	12748	11331
调整R ²	0.736	0.683	0.741	0.660
组间系数差异	0.051***		0.033***	
费舍尔检验P值	0.000		0.000	

(二) ESG建设、企业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

前文的一系列研究,实证分析了ESG建设通过员工就业、员工保障和员工收入三个渠道以影响企业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同时讨论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起到的协同作用。那么,在经济后果方面,ESG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是否还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

积极影响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着眼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从创新激励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以及长期价值改善效应三方面进行拓展性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拓展性分析

变量	<i>Pat1</i>	<i>TFP_LP</i>	<i>TobinQ1</i>	
	(1)	(2)	(3)	(4)
<i>ESG</i>	0.074*** (0.015)	0.013*** (0.004)	0.048*** (0.011)	0.041*** (0.014)
<i>L.ESG</i>				0.046*** (0.012)
<i>L2.ESG</i>				0.043*** (0.016)
<i>L3.ESG</i>				0.033*** (0.011)
<i>L4.ESG</i>				0.050*** (0.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观测值	30655	27034	30176	15374
调整 R^2		0.914	0.756	0.780

1. 创新激励效应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能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金碚,2018)。基于此,本节将从创新激励视角来验证 ESG 建设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影响。由于企业专利往往能反映其创新行为,故本文使用从 CNRDS 数据库中获取的企业创新专利申请数据对企业创新水平(*Pat1*)进行度量^①。同时考虑到企业专利数据的分布特征和计数特点,本文采用零膨胀泊松模型对创新激励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6第(1)列。根据回归结果不难发现,ESG 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还激励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2.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

如何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宋敏等,2021)。基于此,本节将针对 ESG 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能否发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进行检验,并使用半参数法(LP法)测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②。回归结果列示于表6第(2)列。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ESG 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确实还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长期价值改善效应

前文验证了 ESG 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还能够产生创新激励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本节将进一步分析 ESG 建设能否改善企业长期价值,从而全方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托宾 Q 值一般被认为可以客观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盈利能力

^①本文还使用企业创新专利授予量(*Pat2*)衡量企业创新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②本文还使用 FE 和 OLS 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力,是企业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故本文使用托宾 Q 值(企业市值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对企业价值进行度量^①。此外,为了进一步识别 ESG 建设对企业价值的改善作用是短期策略行为还是长期可持续影响,本文借鉴 Cui 和 Qu (2024) 的做法,通过引入 ESG 建设的 1-4 期滞后项进行识别。回归结果分别汇报于表 6 第(3)一(4)列。由回归结果不难发现,ESG 建设对企业价值的改善作用是长期影响,而非短期策略行为,从而验证了 ESG 建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方位赋能作用。

六、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接下来依次从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检验、动态效应检验、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模型设定方式、排除同时期政策冲击干扰等多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测试^②。

1. 替换核心变量

首先,对于解释变量,本文从如下两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测试,以排除指标构建方法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影响:(1)使用 ESG 得分年度均值(*ESG_mean*)和中位数(*ESG_median*)替换原有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2)使用彭博 ESG 评分(*BloomBESG*)和 CNRDS 的企业 ESG 评分(*CNRDSESG*)替换原有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对于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陈林和吴梦萱(2024)的做法,从总体富裕程度与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重新构建企业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Common2*,来替换原有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测试。同时,为避免关键变量均采用合成指标测算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对被解释变量中具有相关性的二级指标进行剔除,并重新构建代理变量 *Common3* 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回归结果依次列示于表 7 第(1)一(6)列。从表 7 的各列结果可以看到,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表 7 替换关键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i>Common</i>				<i>Common2</i>	<i>Common3</i>
	(1)	(2)	(3)	(4)	(5)	(6)
<i>ESG_mean</i>	0.149*** (0.018)					
<i>ESG_median</i>		0.134*** (0.016)				
<i>BloomBESG</i>			0.020*** (0.004)			
<i>CNRDSESG</i>				0.069* (0.042)		
<i>ESG</i>					0.007*** (0.003)	0.074*** (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842	30842	11196	30843	21839	30843
调整 R^2	0.720	0.720	0.743	0.718	0.829	0.731

①本文还使用市值/(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衡量托宾 Q 值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②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检验、动态效应检验、排除同时期政策冲击干扰等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件。

2.交互固定效应

尽管前文实证检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各类不随其他特征变化的个体和时间特征,但模型中仍可能存在某些行业随时间变化、地区随时间变化等不可观测因素的混淆影响。因此,本文采用逐步纳入行业-时间交互固定效应、城市-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城市交互固定效应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以排除这些不可观测因素的混淆影响,回归结果依次见表8第(1)—(3)列。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差异不大,再次表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表8 交互固定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Common		
	(1)	(2)	(3)
ESG	0.108*** (0.014)	0.104*** (0.014)	0.105***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行业-城市交互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观测值	30843	30843	30843
调整 R ²	0.727	0.728	0.719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2011—2021年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围绕企业共同富裕这一重要主题,系统考察了ESG建设与企业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产生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其一,ESG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共同富裕,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其二,机制检验表明,ESG建设主要通过员工就业渠道、员工保障渠道和员工收入渠道以影响企业共同富裕,同时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通过优化员工收入渠道以增强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其三,异质性分析则表明,ESG建设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更高、外部治理压力更大以及融资能力更强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其四,拓展性分析发现,ESG建设在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同时,还能够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改善企业长期价值三个层面有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涵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的企业ESG评级体系。一方面,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ESG信息披露要求和评级标准,将员工收入增长、新增就业岗位、福利保障体系完善等共同富裕表现形式纳入其中,并结合行业特性与企业生命周期,制定分行业、分阶段的信息披露规范,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ESG评级体系建立。另一方面,鼓励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合作编制ESG与共同富裕引导目录,明确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范畴,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将企业共同富裕与政府采购、产业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联动,激发企业主动践行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此外,通过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以促进企业共同富裕。在示范区内,企业可以享受更多、力度更大的激励政策,如政府补贴、信贷便利、技术支持和市场准入优惠等,充分激发企业参与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同时加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形成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合力。

第二,继续推动大数据试验区的纵深发展,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与企业 ESG 建设的协同作用。首先,应当持续推进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大数据技术创新应用,通过数实深度融合为企业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外部制度保障。其次,充分发挥大数据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发企业的数据要素活力,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人才流、资金流共同发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从而为企业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另外,在“后富”地区进一步探索符合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条件的优良试点,拓宽大数据试验区的受益范围,为“后富”地区企业充分利用数据要素资源提供保障和支持,推动区域间企业共同富裕基础的均衡化。

第三,进一步加强员工收入渠道的创新补偿效应。一方面,企业应提升内部创新管理、资源优化配置和外部合作能力,充分利用和激发 ESG 建设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在追求 ESG 目标的同时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提升员工收入水平和优化劳动报酬分配机制。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优化,提升 ESG 建设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充分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这不仅是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公众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重要回应。

参考文献:

- 1.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 2.陈林、吴梦萱,2024:《股权结构与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8期。
- 3.窦欢、孙悦晴、刘婉甯、刘媛媛,2023:《企业年金与现金持有水平:基于员工福利视角》,《会计研究》第6期。
- 4.方明月、林佳妮、聂辉华,2022:《数字化转型是否促进了企业内共同富裕?——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 5.郜栋玺、陈肖雄、张龙耀、项后军,2025:《大数据产业政策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吗?——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第5期。
- 6.何慧华、方军雄,2021:《监管型小股东的治理效应:基于财务重述的证据》,《管理世界》第12期。
- 7.胡洁、于宪荣、韩一鸣,2023:《ESG评级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验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 8.金碚,2018:《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 9.李增福、冯柳华,2022:《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财经研究》第12期。
- 10.李慧云、刘倩颖、李舒怡、符少燕,2022:《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统计研究》第12期。
- 11.李志军、耿末、耀友福,2024:《企业数字化与ESG履责》,《会计研究》第8期。
- 12.刘一鸣、曹廷求、王艺明,2024:《民营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评论》第6期。
- 13.毛其淋、王玥清,2023:《ESG的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第7期。
- 14.聂辉华、林佳妮、崔梦莹,2022:《ESG:企业促进共同富裕的可行之道》,《学习与探索》第11期。
- 15.潘玉坤、郭萌萌,2023:《空气污染压力下的企业ESG表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 16.史永东、王湜森,2023:《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基于ESG风险溢价的视角》,《经济研究》第6期。
- 17.孙伟增、毛宁、兰峰、王立,2023:《政策赋能、数字生态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 18.宋敏、周鹏、司海涛,2021:《金融科技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中国工业

经济》第4期。

19. 谭劲松、黄仁玉、张京心, 2022:《ESG表现与企业风险——基于资源获取视角的解释》,《管理科学》第5期。
20. 王应欢、郭永祯, 202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财经研究》第9期。
21. 王雄元、黄玉菁, 2017:《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22. 温慧愉、杜佳月、高昊宇、李欣明, 2024:《碳市场激励下的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10期。
23. 谢红军、吕雪, 2022:《负责任的国际投资:ESG与中国OFDI》,《经济研究》第3期。
24. 徐妍、宋怡瑾、邵帅, 2024:《低碳转型政策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
25. 张新民、金瑛, 2022:《资产负债表重构: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研究》,《管理世界》第9期。
26. 赵春明、班元浩、李宏兵、刘焯, 202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财经研究》第6期。
27.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2018.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6): 1488-1542.
28. Cui, X., and T. Qu. 2024. "Extreme Heat and Rural Household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7, 103243.
29. Zuo, Y., S. Jiang, and J. Wei. 2022. "Ca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itigate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Evidence from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9: 573-592.

ESG Practices and Corporate Common Prosperity

Dong Xiaolin¹, Zhang Xiang¹ and Gao Dongxi²

(1: College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ESG practices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imperative for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offers a new pathway toward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ddress the strategic goal, this paper utilizes micro-data of Chinese A-share firms from 2011-2021 to explore the nexus between ESG initiatives and enterprise-level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ESG practic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rpora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trengthen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ESG practices influence corporate common prosperity primarily through three channels: the employee employment effect, the employee protection effect, and the employee income effect.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of ESG practices on corporate common prosperity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higher level corporate governance, greater external governance pressure, and stronger financing capacities. Additionally, extended analyses show that ESG practices not only promote corporate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rm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ultimately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words: ESG Practices, Corporate Common Prosperity,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M14, D63, H32

(责任编辑:彭爽)